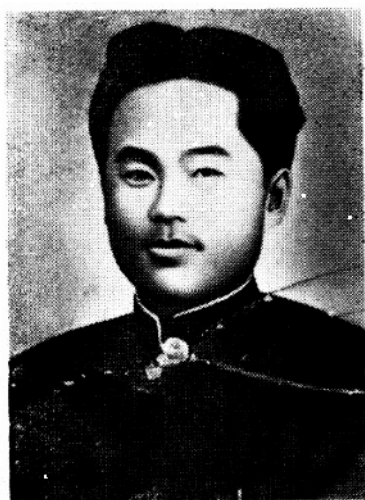


24
汶上文史資料

第二輯

86





陈伯衡烈士遗像

目 录

汶上县历史沿革.....	文史科 (1)
古厥国考略.....	杨昌峰 (6)
陈伯衡烈士传.....	王维芸 (8)
三湖一运.....	南旺镇史志办 (13)
南旺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	南旺镇史志办 (23)
冯玉祥六条训语.....	文史科 (30)
回忆先父王踬臣.....	王承志 (31)
卧佛山古迹.....	县志办 (34)
六区惨案.....	孙汉卿 (39)
汶上杂技.....	李继平 (42)
抗日战争初期文化宣传的回忆.....	董令钊 (49)
解放前汶上县革命根据地教育概况	教育局史志办 (53)
书院小学史略.....	教育局史志办 (63)
汶上县红枪会暴动史略.....	县志办 (68)

惠济行旅

- 田代顺独修木郎桥……………马兴才（76）
- 新中国建立前汶上商业概况……………商业局史志办（78）
- 土地庙子会……………南庄镇史志办（81）
- 汶上城内之当铺——裕成典……………金融志办公室（84）
- 经商谚语……………商业局史志办（87）
- 汶上四尚书……………文史科（91）
- 军阀混战中的褚玉璞……………杨惠先（97）
- 匪首小良子……………康驿乡史志办（109）
- 浙闽总督刘韵珂……………孙汉卿（119）
- 水牛山的书法艺术……………杨昌峰（123）
- 编后记……………（131）

汶上县历史沿革

文 史 科

汶上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地处东经 $116^{\circ}18'$ 至 $116^{\circ}40'$ ，北纬 $35^{\circ}31'$ 至 $35^{\circ}56'$ 。东与宁阳、兖州二县为邻，西和嘉祥、梁山接壤，南连济宁，北枕汶河，与东平、肥城隔河相望。南北六十七点五公里，东西三十五公里，总面积为八百七十七点二二平方公里。全县划为十五个乡（镇），七百七十三个自然村，总人口为六十万三千五百三十四人。

汶上县是一古县，历史悠久，远在四、五千年之前的原始氏族社会，就有先民繁衍生息。仅从康驿、义桥两个乡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二处，其中东尚庄、大徐遗址出土的文物，诸如鼎、盆、^鬲、甗等陶器；针、匕、笄等骨器；铲、斧、磨、棒等石器，均属于大汶口各期文化遗存。

汶上县夏为厥国。明代蒲田人陈纪在《厥亭古迹》一诗中说：“厥国何年别禹畴，至今民物属东周。”是也。

春秋属鲁国，名中都，城邑在今汶上县次邱乡胡口村西北。《山东通志·古迹》汶上县下释曰：“中都邑故城在县西三十九里，春秋鲁邑，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孔子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迁，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则焉。”（《纲鉴易知录》）定公念其功，遂提为大司空。

战国属齐，取名平陆。鲁康公十五年（前338年），鲁败齐师於平陆。（《战国策》）

秦置郡县，天下为三十六郡。（据《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秦三十六郡图》）时属东郡，称平陆县。故城在今次邱乡孔庄北高地。（见“衡方碑”）

西汉（成帝）时，改平陆为东平陆县，隶兖州。（《汉书》）

东汉隶东平国，仍为东平陆县。后并入须昌。（据《汶上县志·沿革》）

三国时，魏国统一北方，其政区设置沿袭东汉。（《山东通志·疆域志》）

刘宋时，废东平陆县，改称平陆县。

北魏时，为平陆县，隶兖州东阳平郡。（据《魏书》）（时郡址设在东平陆城）

北齐时，为乐平县，隶鲁郡。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属鲁郡，改乐平为平陆。”（《隋书》）

唐属河南道郛州东平郡。“天宝元年（742年），改平陆为中郡，移于今治。”（《旧唐书》）天宝十一年（752年），颜真卿书孔子讲书堂碑。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县宰邢审容建大成殿五间。天宝年间，诗圣李白、杜甫常来汶游居，并赋诗留墨。为纪念李白，将水牛山更名为太白山。

五代时期，州县隶属沿袭唐朝。

宋属京东西路东平郡，仍名中都。（《宋书》）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东封泰山，行居中都昭空寺。咸平五年（1002年），重修昭空寺并改名“宝相寺”。

金属山东西路东平府。贞元（主亮年号）元年（1153年），改中都为汶阳。泰和（章宗年号）八年（1208年），更名为汶上（因地处汶水滨，上：侧畔，故名），（《金史》）沿用至今。

元属中书省，隶东平路东平府。（《元史》）

明属东平府，洪武七年（1374年）降府为州，遂属济宁府。洪武十八年（1385年），改属兖州府。（《明史·地理志》）此时重教育人，城内设圣泽书院、汶阳书院，二百年间出八名尚书，仅嘉靖至万历年间，在朝里居官的就有四大尚书。永乐九年（1411年），彩山白英老人，助工部尚书宋礼，挖河治水，引汶济运，做出贡献。

明代《县志·疆域志》记云：“汶上在兖州西北九十里，北至东平州界沙河站二十五里，东至宁阳县界西述村三十里，南至济宁州界康庄驿四十五里，西至郛城县界萧皮口一百二十里。计广一百五十里，袤七十里。”宋、元与明代疆域相同。明《县志·疆域》描述：“宋元以来，左履鲁甸，右跨梁山，背枕泗、汶，面据三湖，封疆广袤，莫之有易矣。”清宣统三年（1911年）编《县志·疆域志》所记汶上疆域亦同于明代。明《县志·编里志》记县分六乡：一平东乡，二劝学乡，三孝义乡，四遵义乡，五坊郭乡，六芦泉乡（县城里）。

清顺治初年，属兖州府济宁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改属济宁直隶州，四十五年（1780年）又改属兖州府。（《山东通志》）清宣统三年编《汶上县志·里甲志》记：县分六乡一百四十四社，一千零六十三村。东乡十七社，南乡三十一社，西乡十九社，北乡十八社，河西乡三十二社，坡南乡二十七社。

民国初年，因袭清末旧制，属济宁道。民国十六年（1927年），撤道属省。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属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属第二行政督察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一月十六日，日军侵占汶上城。同年伪山东省公署成立，设道、县、区、乡，汶上时属鲁西道，县辖十个区：一区驻地汶上城，二区驻地义桥，三区驻地高庄，四区驻地寅阳寺，五

区驻地王楼，六区驻地袁口，七区驻地开河，八区驻地拳铺，九区驻地马村，十区驻地响口。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一月，我人民军队进占汶上城，汶上全境解放。一九四七年初至一九四八年七月国民党占据汶上期间，全县划为二十个乡（镇）：中都镇、泗汶乡、晏山乡、王楼乡、马庄乡、李尹乡、程村乡、寅阳乡、平原乡、南旺乡、三和乡、平易乡、开河镇、黄庄乡、柳秦乡、军拳乡、湖滨乡、马村镇、胜和乡、老僧乡。在此期间，我人民政府时辖六个区，领导全县人民在县境内开展对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陈伯衡为首的汶上先进分子，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举行了永安寺起义，创建了抗日人民武装。一九三九年六月，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汶东办事处，时属鲁西区泰西专署。一九四三年春，属冀鲁豫二专署。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先后将县境之六、七、八、九、十区划属南旺县抗日民主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至十一月，设蜀山特区，刘楼、南旺划归蜀山特区。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汶上先后属冀鲁豫二专署和鲁中南七专署（后改泰西专署）。一九五零年，泰西、泰山两专署合并，称“泰安专署”，汶上县隶属之。

一九五二年，全县增设到八个区。一九五六年一月，将以序数命名的区改为以驻地村命名。即：郭仓（一）区、徐村（二）区、高庄（三）区、林堂（四）区、沟头（五）区、杨村（六）区、城关（七）区、岗上（八）区。一九五三年七月，隶属济宁专署。

一九五六年二月，济宁市的刘楼（五区）、南旺（六区）划属汶上县，名南旺区。同年，将跨运河之袁口、刘口、开河划归梁山县。

一九五八年二月撤区并乡，将原三十一个乡（镇），调整为十六个乡（镇）。同年九月，建立人民公社。十一月，济宁市的康驿人民公社划归汶上县，时汶上县共有八处人民公社，即：红旗人民公社（城关）、东风人民公社（南站）、卫星人民公社（次邱）、运东人民公社（寅寺）、上游人民公社（沟头）、灯塔人民公社（苑庄）、五星人民公社（南旺）、康驿人民公社（康驿）。

一九五九年九月，将东平的城关、沙河站、彭集、须城四处公社划归汶上。

一九六零年三月，将原东平县的城关、沙河站、须城三处公社和寅寺公社的西半部划归梁山县。同时，将梁山县的开河公社和孙庄公社的小屯大队划属汶上县。

一九六一年三月，原东平县的城关、沙河站划回汶上，开河公社和孙庄公社的小屯大队复归梁山县，寅寺公社的西半部，复归汶上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原东平县的城关、沙河站、彭集三处公社划回东平县。

一九六二年四月，将原八处人民公社调整为十五个人民公社，即：城关公社、军屯公社、杨店公社、白石公社、郭楼公社、郭仓公社、苑庄公社、寅寺公社、次邱公社、辛店公社、义桥公社、南站公社、康驿公社、刘楼公社、南旺公社。

一九八三年十月，汶上划归泰安专署。一九八四年四月，将十五处公社改为十三个区。一九八五年五月归济宁市。一九八六年二月，撤区，划为十二个乡和三个镇。

古 厥 国 考 略

杨 昌 峰

汶上县古为厥国。汉代博物学家应劭曾说：“东平陆，古厥国，今有厥亭是。”明代万历戊申编《汶上县志·方域志·沿革》中说：“汶上古为厥国，”并且注说：“《汉书》：‘东平陆及无盐、古厥国’，李白《任城厅记》所称‘北走厥国之墟’是也。”上述资料表明汶上县古为厥国是历代共知的。但这古厥国的都邑在汶上境内的什么地点，是需要考查的。

依据史料记载，可知古厥国的都邑即在今汶上县城。《金史·地理志》中说：东平州“汶上县汉为东平陆，隋改平陆，唐改中都，金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更名汶阳，太和八年（公元1208年）改曰汶上。”这是汶上县名称的沿革。《山东通志》上说：“厥亭即平陆城。”这说明古厥国的都邑和平陆城在同一位置。

《汶上县志》中说：“公署在城西北隅，即汉、唐以来旧址。”这告诉我们汶上县公署的位置自汉代就在汶上城西北隅，至今无变。然而古厥国的公署位置却不在此，据考查应在今汶上县城东门外南边小楼村北面的一片高地上。当时遗址的波及面：西至城内高家园，北到文庙附近，南到南门口附近。在这一带，地下发掘出的古代遗物有骨匕、骨针以及制作骨器的作坊（在县食品公司西南角二十米处，三米以下的小坑内），还有石斧、石锤、石铲等物。在小楼村北面四十米处出土的有六千至万年以上的邯郸石磨盘、磨棒以及石斧等物。出土文物表明，汶上县遗址

年代深远，达万年以上，比夏代古厥国的年代要久远得多。就是说万年以前，这一带就有人类生存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到了夏禹此地始封厥国。据说小楼村北是一片高地，它的制高点和汶上城的西北城墙顶一样高。我们推想在当时洪水横流的时代，古厥国的封主选这片高地设置公署是很自然的。就这里地下发掘的遗物看，制陶业相当发达，可以断定是城镇的中心。唐代李白在《任城厅记》中所说“北走厥国之墟”，这“厥国之墟”的具体位置在他的《别中都明府兄》一诗中已经说到，其诗云：“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东楼喜奉连枝会，南陌愁为落叶分。城隅绿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取醉不辞留夜月，雁行中断惜离群。”（《汶上县志·艺文》）“厥国之墟”即是诗中所说的中都城隅，是指的中都城的东南隅。诗中所说“东楼”即东南隅城楼。《汶上县志·营建》中说：“太白赋诗楼，即城东楼也，内刻《东楼醉起》诗於上。”从诗中可知李白从明府兄处将行之时，明府兄在中都城东南城楼置酒送行，李白心怀惜别之情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出了“厥国之墟”的具体位置。明代蒲田人陈纪的《厥亭古迹》更明确说出了古厥国公署位置，其诗云：“厥国何年别禹畴，至今民物属东周。人心直道无今古，圣化同天岂去留。荒草渐埋幽径合，鲁泉仍抱古城流。谪仙谩说东楼醉，绿水厥亭尚带秋。”这首诗既说明古厥国为夏代封国，又说明唐代李白赋诗之东楼即在古厥国公署厥亭附近。

上述资料表明古厥国的公署位置不在今城西北隅，而在城东门外小楼村以北的一片高地上。

陈伯衡烈士传

王 维 尝

《大众日报》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第一版刊载：“鲁西方面（又讯）：我某团一部在东平东部郑家海与日军二百余名，附有迫击炮一门，机枪七挺接触，遂即展开剧烈战斗。经约五小时之久，敌终不支，向坊城溃退。击毙敌指挥官龙田一名，士兵二十余名，我略有伤亡，此战役民众对我军赠送慰劳品甚多。”此则消息所说战役，即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团长陈伯衡亲临指挥之战役。战斗中，伯衡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三十三岁。

陈伯衡原名陈宪璇，字伯衡，笔名曾用“行鱼”，山东省汶上县城西周村人。他生于一九〇六年二月四日。父兄皆以农为业。伯衡幼年在祖家进私塾读书，十六岁时考入书院高小。他不但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深受同学们的称赞和钦佩，而且还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的危机，十分忧虑。为了唤起群众之救国热情，他在课余时间，和同学们一起到大街聚众演说，宣传爱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爱国活动。对学校当局不民主，压制进步师生生活的反动罪行，伯衡也极力反对。当时曾爆发了打倒反动校长的学潮，伯衡是积极的参加者，直到赶走了那个校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伯衡在县城求学期间，正当列强相继侵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认识到要想解救人民的困苦，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在北伐军到达汶上后，他加入了

国民党组织。

伯衡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在济南上学期间，他接触到了更多的新事物，视野扩大了，对国民党右派抛弃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感到十分气愤，对三民主义救中国开始打了问号。每逢寒暑假回到家乡，在与同学、知己谈到国事时，就发泄心中的苦闷。

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陈伯衡被迫暂时回到家乡。他目睹家乡农民遭受贪官污吏、地主土豪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为气愤。为了给农民出气，他曾利用当时国民党的农民协会组织，斗倒了作恶多端的二区区长房子健。

一九三一年，伯衡在济南一师毕业，随后考入北大经济系。在北大，他除完成课程规定的学习任务外，还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些进步的书籍和报刊杂志。他还结识了杨启哲、王儒林等进步学生。由于各方面的影响，他从思想上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对依靠谁来救中国的问题，他有了新的认识。“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他曾参加北京学生组织的赴南京示威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镇压。他在返回北京途经家乡时，对亲友谈及此事，大讲蒋介石对外屈膝求存，对内残酷镇压工人、学生的罪行。

一九三五年，伯衡北大毕业。他毕业后到济南齐光中学当教务主任，并介绍北大同学杨启哲（共产党员）到齐光中学当代课教师。当时，齐光中学的教师中，有不少人是北大的学生。学校中有一股以闫子桂为代表的托派势力，杨启哲、陈伯衡等人对闫派的所做所为针锋相对。杨启哲常与陈伯衡一起商量事情，研究斗争策略。杨启哲担任历史课，在课堂上联系实际，讲到当时的抗日救国问题，讲了些抗日救亡的道理，不慎被反动当局注意了，在这危险的情况下，伯衡帮助杨启哲稳妥地离开了齐光中

学，去上海搞全国学联和全国救国会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当时，汶上县的爱国知识分子曹志尚、刘启文、曹麟周、张云峰等人，以城内力生合作社为联络点，秘密酝酿抗日救亡活动。十月，韩复榘的军队仓惶南逃，陈伯衡也随流亡学生从济南南撤，在途经汶上家乡时，刘启文、曹志尚等人便把酝酿抗日救亡的打算告诉了伯衡。伯衡非常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抛离家乡苟安偷生，于是毅然决定留在汶上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在开始酝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时，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举什么样的旗帜，依靠谁来领导的问题，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被别人吃掉。当时对这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以陈伯衡为代表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只有依靠共产党来领导才靠得住，于是大家便公推陈伯衡两次亲自去济宁找鲁西南工委负责人江明同志联系，要求派人加强领导。江明便以“民先”的名义把正在三路军政训处学习的刘星（共产党员）调出介绍给陈伯衡。刘星随陈伯衡来到汶上，住在陈伯衡家中。为了开展工作，陈伯衡和刘星等人便走村串乡，利用各种关系，联络爱国人士。他们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口号，并先后在场小学和战湾村召开了两次较大的骨干分子会议，商讨武装起义事项。陈伯衡和刘星还去东平同万里联系，在人员和枪支弹药方面得到了大力支持。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寇占领了汶上县城，汶上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亡国奴境地。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按照陈伯衡、刘星等人的事先部署，汶上、东平两县的爱国知识分子、农民共九十多人，六、七十支枪，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聚集在原汶

上县七区申垓村附近的永安寺大庙，拉起了抗日队伍，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名为“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以刘星、陈伯衡为主要领导人。这支队伍拉起后，曾转战于黄河两岸的汶上、东平、宁阳、肥城、泰安、平阴、聊城、冠县等地。由不到百人的地方游击队，逐渐由小到大，先后编为范筑先领导的十支队挺进队、十支队东进梯队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一团，成长为泰肥东汶地区的一支抗日主力军。陈伯衡在这支队伍中先后任挺进队队长、东进梯队司令、六支队一团团长等职。

一九三九年春，陈伯衡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在泰西地区时，经刘星、杜子俭介绍，部队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的三月二十二日，六支队一团和一一五师的六八六团在东平县郑家海一带，与日寇作战时，陈伯衡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军民无不悲痛。战后，鲁西区党委在东平县的常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在会上讲了话。

陈伯衡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同志不管是交待任务还是进行教育，总是讲清道理循循善诱；他平时还爱开个玩笑，不摆官架子。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讲个人享受。他很注意关心士兵疾苦：队伍刚刚拉起时，群众给筹点熟食，伯衡总拣粗的、孬的吃，好的留给战士。晚上他和战士同睡一样的草铺。

陈伯衡一生酷爱学习。他不仅在上学、教学期间勤奋学习，即使在抗击日寇的游击战争的环境里，他仍然挤时间学习。他爱借书籍象战士爱惜枪支一样，行军到哪里，把书带到哪里，宁愿自己走着，也要让马匹把书驮着。他学习的书籍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鲁迅、高尔基的文学著作。他知识渊博，善于演说，绘声绘色，很有鼓动性。在抗战初期，他不仅在汶上境内的各联络点宣讲马列主义学说，还曾在东平县的田大店、马公祠小学等地召开的抗日积极分子会议上讲政治经济学，讲抗日

统一战线，讲游击战争。他讲得深入浅出，很受同志们的欢迎。

陈伯衡在对敌斗争中机智勇敢，临危不惧。一九三八年春，起义部队驻杨集村时，为了搞好对国民党人员的统战工作，陈伯衡和其他几位同志，曾到沙河站，找到住在那里的国民党汶上县长崔百朋，磋商共同抗战，避免磨擦问题。在谈判时，双方卫兵呼地抽枪对持起来，场面十分紧张。崔百朋吓呆了。这时陈伯衡非常镇静地站起来厉声喝道：“把枪都给我收起来，我们是谈判问题的，不是来打仗的！”崔百朋这才连声附和地说：“把枪收起来，把枪收起来。”才缓和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我们的同志安然回到自己的驻地。

陈伯衡不仅自己献身国家，他的两个侄子陈允海、陈允桐也都参加了起义部队。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他们先后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生命。陈伯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

陈伯衡光荣牺牲四十余年了，他的名字和他的业绩仍在汶上人民中传颂着。他将永远鼓舞着汶上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战斗中，奋勇前进。

三 湖 一 运

南旺镇史志办

“三湖一运”系指位于汶上县西南部的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和纵穿汶上县西南部的京杭大运河。“三湖一运”不仅对汶上县的交通运输、农业发展、经济繁荣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它是汶上县文化发展的摇篮。自古以来，这一带幽美的湖光山水和灿烂的文化吸引了历代墨客骚人、帝王将相前来观光，特别是大运河纵穿汶上西部而过，成为历代南北交通的主动脉以后，南来北往的官、商、民船必经此地。如清代乾隆皇帝六次南巡都在此地逗留，并在此赋诗抒怀。如此以来，就给我们汶上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古迹。浏览汶上县的古迹、文化志，可知汶上的文化古迹城南居多，而尤其多在南旺湖一代。如是种种，与“三湖”的秀美风光和大运河纵穿汶上西部而过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湖河的演变

随着岁月的流逝，自然形态的自身在发生着变化，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使大自然的原始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所以，经过千百年不断演变而成的今日之“三湖一运”已不再是古代的湖河形态了。下面把湖河演变的大概情况简介如下。

春秋战国至秦汉年间，在今巨野、嘉祥、汶上、梁山、郛城之间有一较大的湖泊，先后称“大野泽”、“巨野泽”、“大泽”等。南北朝时期，由于桓公渠的出现，泽分为二，渠东名